



文艺要以反映时代精神为使命

□白桦

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新中国在高歌猛进中蓬勃发展，虽然遭遇了不少的坎坷与曲折，但总体向前的社会态势保持始终，而这也促动了“十七年文学”在“农村生活题材”“革命历史题材”两大主潮主导下的创作活跃与作品丰繁。而在此后的“文革”十年，因为社会生活日趋政治化，一大批优秀作家作品被批判和被查禁，“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文艺创作空前萧瑟，文艺批判横行无忌，文艺生活极不正常。

正是在粉粹了“四人帮”之后，社会生活开始回归于正常轨道，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深化的90年代，全面腾飞的新世纪。文艺创作也由70年代后期迅速复苏，新时期之后又在内外因素合力推动下，不断走向创作繁荣与批评活跃。以茅盾文学奖彰奖的长篇小说为例，这个由中国作协于1981年3月正式设立的文学奖，自1982年12月首届开评以来，以大致四年一届的频次（前两届分别为5年和3年），已在33年间评选了9届，先后有43部作品获奖。虽然每届无无一定的争议，但总体来看，还是反映了长篇小说四十多年来创作的基本演进与大致水准。其中的《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尘埃落定》《你在高原》《一句顶一万句》《秦腔》《繁花》《江南三部曲》等作品，所具有的思想蕴含与艺术成就，无疑是这个时代长篇小说创作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的重要标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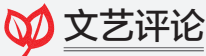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这近40年，文学不仅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门类，都有为数众多的优秀作品联袂而来，而且全新形态的网络文学依托着网络科技长足崛起，构成与传统形态的纸质文学交相辉映的电子文学与数字阅读。已有人把蓬勃兴起的中国网络文学，看作是与日本的动漫、韩国的电视剧并足而立的东亚“文化三绝”。而这一切的不断实现，如若不是我们所处于的这个时代的云蒸霞蔚，我们所置身的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我们所驻留的文化空间的丰博广大，不仅是难以达到的，而且是难以想象的。

在两次重要的文艺工作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多角度和多方面地强调和论述文艺与时代的关系，要点在于揭示文艺与时代的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要义在于要求文艺工作者把反映时代生活和时代精神作为自己的使命，并提升到神圣的位置，这可以说既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也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事实上，处于一定时代的作家艺术家，既不一定自然就是时代生活的随行者，也不一定必然就是时代精神的歌吟者。毋庸讳言，在当下的文艺领域，所谓表现“自我”的写作屡见不鲜，所谓疏离时代的写作也大有人在。还有一些写作，只以游戏为旨归，以娱乐为目的。在文艺如何面对时代，如何处理生活这一方面，我们确实需要认真地自省，也确实需要真正的自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在文艺创作上，“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就成为文艺工作者需要不断进行自我检省和自我调整的现实问题。

在论说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当下时代的人民生活，一再强调文艺要“积极反映人民生活”“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显而易见，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革，既是“中华民族新史诗”，也是这一代文艺家最该写作的题材和最能反映的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艺术，总的来说，是与时代同频，与现实同行的。但仔细检视起来，真正以改革开放的壮阔历程和由此引发的人民精神巨变为表现对象的小说写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力作，数量既不很多，质量也明显不高。摆在作家艺术家面前的，确实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努力创作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我们这个蓬勃发展的国家相匹配的优秀作品”。



文艺评论

别让资本“导演”电影

新世纪以来，随着产业化步伐的加快，电影行业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创作上，从作者化向大众化转向，寻求大众趣味，以最大公约数为基准的流行趣味被膜拜。艺术的要义是创新，这需要对人性有深入的挖掘，对人与周遭世界的关系有独特的发现。

□陆绍阳

2016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达457.12亿元，中国电影自从2002年全面实施产业化政策以来，电影产业振兴已经取得明显成效，时隔14年后，票房收入和2002年的10亿元相比，已经翻了47倍，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市场的繁荣是由多方合力促成的，其中资本的力量尤其明显，一方面，它对市场规模的扩展，电影生产力的解放，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它的逐利性，甚至贪婪性也直接影响了电影创作的方向。

首先，资本的逐利性约束了创作的自由度。现在每年都会造就几位迈进亿元俱乐部的导演，这时，资本就会快速跟进，资本是有嗅觉的，哪里有利润就会往哪里流动。吸引那些高票房导演的条件相当优

越，但资本的投入是要求回报的，在给导演奉上丰厚股份时，都会附带两个条件，一是签订多部戏的长约，二是对高票房的要求。这无形中也就束缚住了创作者的手脚，导演拍任何影片时，就要以市场回报为先，拼命寻找“爆款”产品。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效仿票房成功的类型片，符合流行趣味、明星阵容、视觉效果成为标配，可以预见，这样“配方式”的产品将会越来越多。可以说，成也资本，衰也资本，资本进入电影业本来是好事，但如果背离了电影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核心，商业属性压制了审美属性，电影产品就不可避免地趋向单一，电影的多样化发展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其次，资本快速回本的要求使得创作者顾不上花时间打磨作品，因为都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高额

“文质彬彬”与“尽善尽美”

——关于人格修养与书法艺术的关系

□张利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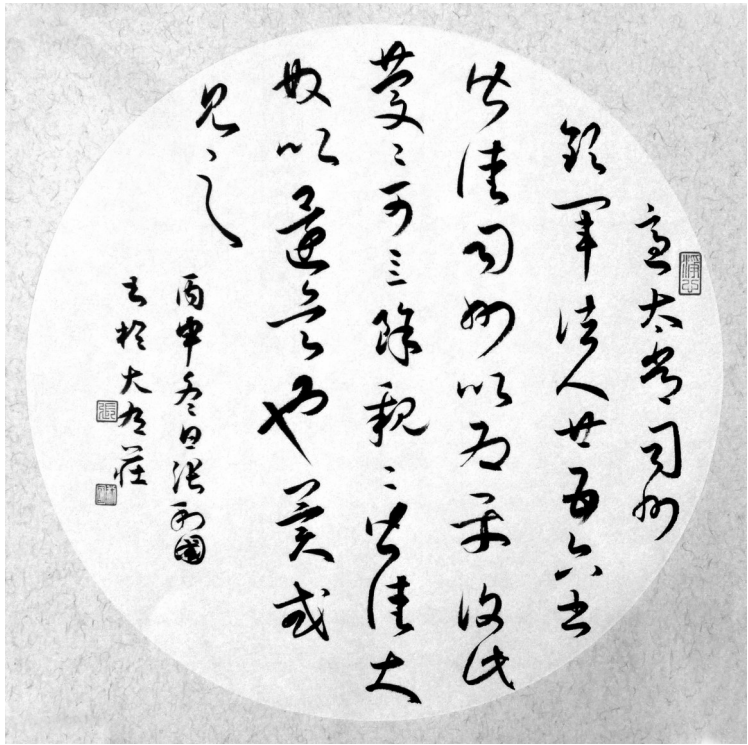
“文质彬彬”与“尽善尽美”是中国古典美学史上的两个重要命题。“质”与“文”的统一，即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善”与“美”的统一，即伦理与审美的统一，德与艺的统一。

“文质彬彬”一词出自孔子《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大意是，质朴胜过文采，就会粗野；文采胜过质朴，就会虚浮。“文质彬彬”指既不偏于质，又不偏于文，不偏不倚，才有望成为君子。清代学者刘宝楠指出，“文”指外在表现须合乎“礼”，“质”指内在修养须合乎“仁”。“质”与“文”、“仁”与“礼”的关系，反映出孔子所推崇的君子的理想人格。

关于“文质彬彬”在书法艺术中的体现，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指出，书法以“笔”为“质”，以“墨”为“文”，“文”不能离开“质”而单独存在，脱离“质”的“文”是缺乏内涵的。刘熙载认为，艺术应该“尚实”，而不应“尚华”，“孤质非文，浮艳亦非文”。只注重形式的艺术会走向穷途末路，多注重内容的艺术才会日益广袤。可见，“质”与“文”不可分离，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只有追求“文质彬彬”，书法艺术水平才能蒸蒸日上。

“尽善尽美”一词出自孔子《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认为，韶乐不但符合审美要求，而且符合伦理要求；而武乐只做到“尽美”，而未做到“尽善”。在孔子看来，“乐”作为一门艺术，不但要悦耳动听，而且要有“仁”的内涵，缺乏“仁”的“乐”是不完美的。孔子将“善”与“美”相区别，同时又相统一。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做不到“仁”，那么“乐”对他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说，作为艺术家道德修养不够，与艺无益。只有追求“尽善尽美”，才能德艺双馨。

王羲之书法中流露出“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中庸之美，李世



张利国临王羲之《适太常帖》

民对王羲之书法的评价是“尽善尽美”。这和李世民的文艺观有很大的关系，他反对浮艳的艺文风格，曾提出“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的中庸审美观。元初政治家、思想家郝经指出，王羲之人品正直，有见地，风度高远，书法韵胜道婉，出神入化，为古今第一。王羲之的书法达到了“善”与“美”的高度统一。

“文质彬彬”与“尽善尽美”虽然是两个美学命题，但在书法艺术中却有异曲同工效应，表现为人格修养与书法艺术的高度统一。人格修养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儒家，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指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根本在于诚意正心。诚意正心是修身的前提，修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落脚点，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始发点。可见修身的重要性。《论语》指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孔门四科中的“德行”排在“言语、政事、文学”之前，可见孔子

回报，那些已经有了人气指数的IP被疯狂追逐，一首流行歌曲、一出舞台剧、一部网络小说、一个电视栏目，只要一时有人追捧，就会被制片人抢购，于是，7天拍一部电影的现象也不足为奇了。快速推向市场，趁IP的热度没散，实现最大限度的市场回报，制作速成、通俗、短期流行的作品就成为通行的法则。但从从业者可能都忽视了一个常识，在文化发展中，速度只能代表效率，并不能真正体现文化的繁荣。快甚至是艺术的敌人，急躁章生产出的“快餐式”作品不可能有多少文化含量，因为文化的醇香来自于“慢炖”和“熬制”，文化之树需要耐心的培育，缓慢的生长，否则只会导致徒有其表的空心化。

资本快速回本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借助植入广告，尤其是高成本电影制作者会千方百计让资金尽快回笼，植入广告被认为是最便捷的选择，创作未动，营销先行，植入广告也就成为干预电影创作“看不见的手”。稍加琢磨，就会发现，有能力在银幕上做广告的往往是大型企业，特别是奢侈品公司，为了配合植入商品，场景的设置，人物的身份就要受限定。绝大多数情况下，城市中高等收入人群的生活空间和日用消费品才有植入的机会，这就导致了故事的单一化和空间的狭窄化，无形中就排挤了人民大众的生活空间，农村生活更是在银幕

上难得一见。这样的影片多了，就会造成观影者对中国人真实生活认知的错觉，而随着植入的强制性商品被不断展示，消费主义倾向被推崇和合理化，一种崇尚精致、奢靡生活的价值观可能被放大，而原先的节俭观念被放弃，最终导致中国的传统美德被改写！

如果资本当道，要不了多久就会改变整个电影的生态，因为作品、创作者和观众之间是一种互为影响的关系，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制片人来投其所好，就有什么样的电影，比如，网生代构成了电影的主力消费群，那制片人就不断推送玄幻、穿越剧来迎合他们，这些都是商业逻辑侵蚀文化逻辑的表现。

新世纪以来，随着产业化步伐的加快，电影行业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创作上，从作者化向大众化转向，寻求大众趣味，以最大公约数为基准的流行趣味被膜拜。艺术的要义是创新，这需要对人性有深入的挖掘，对人与周遭世界的关系有独特的发现。电影是文化的一部分，因为受众面广，影响力大，成为提升全民族文化品质最便捷的途径，但如果电影一味由资本逻辑主导，就会离艺术渐行渐远，它作为文化的贡献也就几无可能。



的先河。欧阳修认为古人都能写字，但只有贤德之人的书法才能传播久远。后世之人只忙于写字，而不研究书法传承久远的根本所在，因此能写好字的人不计其数，但大部分都被历史遗弃、得不到传承。苏轼在欧阳修的基础上提出，“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关于书品与人品的关系，他认为观其书，知其人，书中可以看出君子小人之心。北宋著名诗僧惠洪认为字写得再好，但道德修养不够的话，名声仍然会被埋没。他说：“字工德不修，名与身俱朽。”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书法家傅山认为，“作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刘熙载认为，“写字者，写志也”。并且完整地提出了“书如其人”的思想，“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书法作品既是书家的创作产物，更是书家精神气格的对象化。观书知人，透过书法艺术可以观看人格修养。人格修养提高了，书法艺术水平必然会提升。钱穆说，中国艺术不仅在心情娱乐上，更要在德行修养上。艺术价值之判定，不在其向外之所获得，而更要在其内心修养之深厚。可见内在修养对于艺术的重要性。书法艺术水平提高的前提是人格修养的提升，人格修养与书法艺术相统一，才能真正做到“书如其人”。在书法创作的过程中，如果忽略了书作的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如果书家内心空虚，修养不够，即使形式上做得很美，书作也是缺乏内涵的，甚至矫揉造作的，难以得到品评者的认可，更不会在历史上流传下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要以深厚的文化修养、高尚的人格魅力、文质兼美的作品赢得尊重，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书画频道

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是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中都高度关注并充分论述的一个理论要点。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文艺和时代的联系时说：“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2016年11月，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着重指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由此出发，他进而得出“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的论断。这样把反映时代生活和时代精神看作为文艺的使命，并提升到神圣的位置，可以说是对文艺发展规律的一个高度总结，也由此给文艺工作提出了一个应有的时代基准。

文艺从来就不是抽象的存在，必然系连着一定的社会与时代。鲁迅说过：“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文学属于一定的时代，一部中国文学史实际上也是中国历史演进的文字记录。纵观我国的文学史，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样式与特色，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再到现代文学的发生、当代文学的繁盛，都是特定社会与时代的文艺成果与精神结晶，它们不仅共同铸就了灿烂的中国文艺星河，而且以文艺的方式引领社会思潮，成为我们民族奋然前行的精神灯火。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演进的近70年，也充分证明文学的发展变化，与一定的社会状况内在牵连，其起伏的情形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从1949